

变形书写与死亡想象

——析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双重叙事运动

唐伟胜¹ 王玲^{2,3}

(1.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3. 赣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目前,学界对《变形记》的评论都围绕格里高尔变形后的不幸存在这一显性情节展开,而对小说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运动却鲜有涉及。透过小说的变形书写和双重叙事距离,读者可以发现隐含其中的死亡想象。在隐性进程中,格里高尔的变形意味着他的死亡。死亡叙事围绕两个维度展开:格里高尔灵魂的超脱之路,以及家人的悲痛经历。隐性进程中的死亡书写折射出卡夫卡的死亡恐惧,是卡夫卡式死亡体验以及反向的存在言说。《变形记》中的双重叙事运动呈现出文本折叠式的故事形态,不仅丰富了小说的主题内涵,而且赋予故事强大的叙事张力,从而增强了其作为经典的文学魅力。

关键词:《变形记》;死亡想象;双重叙事运动

中图分类号:I514.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5-0065-10

0 引言

《变形记》(1912)是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自发表以来,有关《变形记》的解读可谓不胜枚举,但大体可分为“寓言式”和“反寓言式”两类。其中,寓言式阐释居多,包含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宗教哲学理论框架和视角下的“现代异化”论(紫葳,1980:102)、“欲望及满足”观(Krause,2019:319)和“罪与罚”之说等(Bruce,1996:109;索克尔,1988:238-255)。这类评论聚焦于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其人,揭示人与他者、社会、父权秩序以及人类宿命之间的多种冲突。反寓言式解读则围绕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其动物性,采用后人类理论,探讨动物和人的冲突,揭示人在成年过程中对非人类动物的疏离(Harel,2020:27-33)。上述两种阐释虽然在格里高尔变形后是人还是动物的问题上观点不一,但均围绕“甲虫-格里高尔”被家人厌弃并最终死亡的不

收稿日期:2025-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物叙事研究”(23&ZD3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伟胜,男,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叙事学及欧美文学研究。

王玲,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比较文学及叙事学研究。

引用格式:唐伟胜,王玲.变形书写与死亡想象——析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双重叙事运动[J].外国语文,2025(5):65-74.

幸遭遇展开,都是在“不幸情节”的表层或深层意义的框架内运作。少有学者关注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作为亡魂的存在,进而发现并探讨文本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运动。虽有学者指出,由格里高尔的“语言焦虑、身份焦虑和情感焦虑”所建构的“叙事暗流”隐藏于情节之下(孝红波,2018:75),但其论述仍属于情节层面的心理解读,而不是贯穿小说始终的隐性叙事进程。

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运动(也称双重叙事进程)是由我国著名学者申丹教授提出的重要概念。申丹认为,在很多文学作品的显性情节背后,都存在隐性进程,而且这个进程是“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的一股叙事暗流。它沿着情节背后的另一条表意轨道,表达出另一种主题意义,突出人物形象的另一个侧面,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价值”(申丹,2020:49)。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共同构成了文学作品中的双重叙事进程。基于此,笔者发现在《变形记》的显性情节下面,自始至终都潜藏着“死亡叙事”这一隐性进程。在此进程中,格里高尔的变形意味着他的死亡。《变形记》可谓是卡夫卡的一次死亡书写实验,想象并勾勒了格里高尔的灵魂如何超越在场的执念并最终平静离开,以及他的家人如何接受其死亡并重启生活这一艰难过程。通过挖掘故事中的死亡叙事并剖析双重叙事运动,读者可以窥探卡夫卡内心深处的死亡恐惧,洞察卡夫卡式死亡哲学,揭示基于情节研究不能发现的主题意义,从而丰富对经典小说《变形记》的阐释。

1 变形:存在问题与死亡问题

变形,即自然万物之间的转化变易,往往会引发主体的存在困惑,正如庄周梦蝶后的疑问“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人抑或动物?庄子一时分不清梦境自我的存在形式。不仅如此,变形也关涉死亡问题,最早见于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转世说,“不死的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身体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又会重新进入另一个身体……它也可能进入另一类动物的躯体”(段德智,2017:61)。《变形记》开篇荒谬离奇的变形和陌生化的甲虫-格里高尔形象,既关联人/动物的存在问题,也涉及生死问题。存在与死亡的问题分别生发出故事的显性情节和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显性情节围绕“格里高尔其人”与“甲虫动物”两条表意轨道展开,而隐性进程则围绕“格里高尔的亡魂”展开。

在情节发展中的格里高尔其人这一表意轨道上,由于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仍保留了人类的记忆和思维方式,甲虫-格里高尔被等同于甲虫式的人;而在甲虫动物这一表意轨道上,因为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有难以操控的外壳和甲虫的习性,甲虫-格里高尔则被等同于具有人性的动物。格里高尔其人这一表意轨道由于预设了格里高尔的存在,变形往往被看成一种“异化”“被压抑的欲望”以及“疾病”(江澜,2020:47)的象征。甲虫动物这一表意轨道则预设了甲虫的存在。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文物种可变论以及尼采的身体本体

论相呼应,讲述动物受到人类疏离的故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卡夫卡和文学动物研究者关注《变形记》中的动物书写,分析甲虫身体、习性、主体性以及甲虫与人类的互动。

在隐性进程中,格里高尔的变形意味着他的身体死亡,这与显性进程中将变形视为“异化、欲望和疾病”的观点形成对照。关于格里高尔的身体消亡,故事一开始的变形描写就有所暗示。变形后的格里高尔没有表现出作为人的任何体征,其“铁甲一般的背”“棕色肚子”“弧形的硬片”都表明,格里高尔人类的身体已经消失。根据死亡学二元论的观点,“死亡是心灵——非物质的灵魂——和肉体的永久分离”(卡根,2016:24)。格里高尔的肉体不知所终,无法和灵魂再度结合,这也就暗示了格里高尔的死亡。格里高尔的死亡发生在睡梦中,卡夫卡就曾提到过睡眠时的死亡。“在失眠背后,也许只隐藏着对死亡的巨大恐惧。我也许害怕,灵魂在睡眠时离开我就再也回不来了。”(卡夫卡,2015a:371)格里高尔身体消亡后,其灵魂并没有消散,而是藏于甲虫的身体里。不难看出,卡夫卡的死亡书写明显受到毕达哥拉斯思想和变形文学书写传统的影响。他借助变形来想象人死后的情形。在致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的信中,卡夫卡讨论过写作中的死亡想象。“天真的人有时暗暗希望:‘我恨不得死去,看看人家是怎样哭我的。’一个这样的作家持续不断地实现着这一愿望,他正在死亡(或者说他不是活着),不停地哭泣。”(卡夫卡,2015c:21)由此可见,卡夫卡的变形书写其实也是他对死亡的一种想象性勾勒。

在隐性进程里,格里高尔身体死亡但灵魂犹在,因而甲虫-格里高尔就是格里高尔的灵魂。换言之,格里高尔只是作为亡魂而存在。幽灵批评理论认为,亡魂或幽灵是一种侵扰性和间质性存在。“幽灵的本质是介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存在,它不断侵扰人的精神意识。”(申富英等,2022:56)亡魂格里高尔的首要特征在于其间质性。一方面,格里高尔的灵魂不同于飘荡徘徊、无形的亡魂,他有一副甲虫的躯壳。躯壳回应、起床和开门,这些动作给家人留下了一串有迹可循的在场的踪迹,让他们产生格里高尔还活着的错觉。因此,格里高尔是在场的。另一方面,格里高尔的灵魂无法自如操控甲虫身体,其动物声音无法让家人确知他的存在,所以他又是不在场的。亡魂格里高尔的另一特征是其侵扰性。他的“非存在的存在”造成了家庭混乱,搅动家人的心绪。事实上,他的侵扰性来源于“人类意识和潜意识的投射”(申富英等,2022:58),是家人丧失之痛的心理投射。申富英认为:“幽灵批评理论关于阅读的幽灵性以及关于文学幽灵人物和幽灵元素的各种研究,也可能会对我们理解和研究隐性叙事进程的实质、形式、作用机制和形成机制等大有裨益。”(申富英,2022:134)《变形记》中亡魂格里高尔的间质性和侵扰性与死亡叙事这一隐性进程的形成密切相关,格里高尔灵魂从逗留到退场的过程也构成了隐性进程的重要部分。

大多数研究者忽略《变形记》开篇的死亡问题,认为格里高尔的死亡发生在故事的结尾。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小说开篇的死亡。埃瑞斯·布鲁斯(Iris Bruce)和迈克·P.

瑞恩(Michael P. Ryan)分别从犹太民间文化和佛教哲学角度切入,指出变形意味着灵魂的流放和重生。然而,两者都没有注意到格里高尔灵魂的逗留和家人的悲痛,也就没能探讨小说的隐性进程。笔者认为,只有结合小说开端的死亡问题和后文中格里高尔灵魂的逗留和家人的悲痛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才能发现贯穿始终的死亡叙事暗流。

2 双重叙事运动:不幸叙事与死亡叙事

《变形记》的双重叙事进程由情节发展的不幸叙事和隐性进程的死亡叙事构成,且两者间存在“双重叙事距离”。申丹认为:“隐性进程沿着不同的主题轨道在情节发展背后运行,一般都会带来叙事距离的变化。叙事距离存在于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申丹,2021:88)《变形记》显性情节中的叙述者、格里高尔与家人之间的叙事距离与隐性进程中三者之间的距离有所不同。在情节发展中,叙述者与格里高尔之间的叙事距离相当小,叙述者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格里高尔的家人。叙述者和格里高尔协同完成了变形后格里高尔的不幸叙事。在隐性进程中,叙述者与格里高尔之间的叙事距离增大,而叙述者与格里高尔家人的叙事距离缩小。叙述者将反讽的矛头对准格里高尔,叙述者和格里高尔两者复合的叙述视角完成了贯穿首尾的死亡叙事。有学者强调了叙述者和格里高尔之间的叙事距离,认为小说糅合了格里高尔和叙述者的差异视角,形成了具有内在张力的复合性双重叙述视角(胡志明,2007:300)。这一论述止于情节发展的美学层面,而未论及双重叙事运动中叙事距离的变化。

2.1 篇首的双重叙事运动

在小说的开篇,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走出房间之后,情节发展聚焦于甲虫-格里高尔被驱赶的不幸和格里高尔父亲的粗暴举动。这彰显了叙述者对父亲的批判。格里高尔的叙事视角也调动起读者对他的同情。当甲虫-格里高尔开门露面时,“父亲恶狠狠地捏紧拳头,仿佛他要将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似的,随即犹豫不定地扫视了一下起居室,接着便用双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他宽阔的胸膛颤抖着”(卡夫卡,2012:48)。此句中的“捏紧拳头”在格里高尔其人这一表意轨道上通常被理解为父亲意欲以暴力掩盖格里高尔当众出丑的倾向。而在甲虫动物这一表意轨道上,“捏紧拳头”表明人类对动物的暴力排斥企图。当格里高尔追着秘书主任到起居室,父亲“用左手从桌子上抓起一大张报纸,一边跺着脚,一边挥动手杖和报纸,要把格里高尔赶回到他的房间里去”(卡夫卡,2012:51)。在格里高尔其人的表意轨道上,父亲挥动手杖将格里高尔赶回房间是格里高尔“失去自我”的标志(Krause,2019:314)。而在甲虫动物的表意轨道上,“报纸起到了转喻的作用,代表了人类的理性,用来压制和排斥其他动物”(Harel,2020:25)。格里高尔被人类理性和人文主义排斥在人类的空间之外。

与显性情节对照,在第一部分的结尾,隐性进程则聚焦于家人悲痛时的震惊以及亡魂格里高尔对家人悲痛反应的不理解,暴露出叙述者与格里高尔之间增大的叙事距离。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zabeth Kübler-Ross)对居丧者心理的研究,丧失的悲痛通常会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Kübler-Ross, 2005: 18)。“震惊而麻痹或浑身麻木”乃否认阶段的最初反应(Kübler-Ross, 2005: 19)。亡魂格里高尔出场时,其母面对儿子突如其来的死亡,表现出极度的震惊和难以承受的悲痛,以至被击倒在地。相比之下,父亲则极力抑制内心的悲痛。父亲“捏紧拳头”,表明他在和可怖的死亡暗暗较劲,以免被丧子之痛击垮。虽然父亲极力抑制悲痛,但他后来还是忍不住哭了。“宽阔的胸膛颤抖着”是一种无声的哭泣。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父亲“仿佛”要将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卡夫卡, 2012: 48)。“仿佛”一词暗示了叙述者语气的不确定性,因而消解了显性情节层面的父亲暴力倾向的解读。接下来,父亲驱赶格里高尔的做法应是出于对母亲的保护。驱赶场景的叙事从亡魂格里高尔与叙述者的复合视角展开,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灵魂对父亲的评价与叙述者讲述之间的距离。格里高尔的灵魂对父亲作出了负面评价,认为父亲的举动是“慌乱”的,不够“镇静”,甚至是“无情”的(卡夫卡, 2012: 51)。但是,由于叙述者讲述的是父亲看到儿子已死时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上述反应实属正常。此外,格里高尔的灵魂以为“父亲手中的手杖随时会照准他的后背或头部给以致命的一击”(卡夫卡, 2012: 51),但父亲并没有用手杖打他的意图,只是“时不时远远地用手杖尖头指点旋转动作”(卡夫卡, 2012: 52)。可见,格里高尔的灵魂对父亲的评价失之偏颇。这种不客观的评价主要源于刚刚死去的格里高尔误以为自己只是身患小疾,无法理解亲人的悲痛反应。

2.2 篇中的双重叙事运动

小说中间部分的显性情节讲述了格里高尔被困房间、被父母疏离甚至被砸的不幸。在此部分中,叙述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格里高尔的父母。有学者指出,格里高尔被困房内象征其自由反抗的失败(索克尔, 1988: 253)。在格里高尔被困的“头十四天里父母鼓不起勇气进来看他……”(卡夫卡, 2012: 61)显性情节强调父母害怕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因而“鼓不起勇气进来看他”。这表现了父母对变形后的格里高尔的疏离。当格里高尔第二次爬出房间时,却被父亲用苹果砸伤,这形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在格里高尔其人的表意轨道上,有学者将父亲的袭击行为视为对人类原罪和贪婪欲望的惩罚(Bruce, 1996: 116; Krause, 2019: 316)。在甲虫动物表意轨道上,也有学者称,向甲虫身上砸苹果的行为连接了反兽性罪和人类原罪(Harel, 2020: 25)。

小说中间部分的隐性进程讲述了格里高尔灵魂的逗留以及家人对丧失亲人的否认与愤怒。与格里高尔被困房间的显性情节不同的是,在隐性进程中,灵魂逗留房间。叙述者

叙事暗含了对灵魂在场执念的如下反讽:不愿离去的亡魂格里高尔遮住自己的甲虫躯壳,欲以此来“体谅”(卡夫卡,2012:54)家人并彰显自己的在场。然而,叙述者对格里高尔在饮食和兴趣上的持续变化的描述,暗示着格里高尔渐渐遗忘了生前的习惯和记忆,离家人越来越远;格里高尔的灵魂执意要帮助家人,而叙述者却展示出灵魂的尝试适得其反。叙述者的叙事揭示出,格里高尔灵魂的在场执念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带给他无尽的羞愧和自责的痛苦。父母“鼓不起勇气进来看他”这一细节表明,父母无法承受并极力否认格里高尔之死。事实上,家人希望格里高尔能复原如初。后文中,家人对格里高尔复原的愿望迟迟没有实现,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绝望甚至愤怒。父亲一进门就喊:“‘啊!’……声音里仿佛既有愤怒,也有喜悦。”(卡夫卡,2012:67)对聚焦于惩罚主题的情节发展而言,“喜悦”一词很重要,它暗示父亲终于找到了惩罚格里高尔的理由。就隐性进程而言,“愤怒”很重要,体现了父亲那种绝望之后不受控制的悲哀宣泄。“他用餐具柜上水果盘子里的苹果装满了自己的衣袋,也不好好瞄准,便将苹果一只一只地扔将出来。”(卡夫卡,2012:68)“不好好瞄准”,说明父亲扔苹果意在发泄愤怒,而不是故意伤害甲虫-格里高尔。由于甲虫躯体象征着格里高尔的死亡,因此,父亲迁怒于甲虫躯体。父亲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愤怒其实给予了他一种力量,是对死亡的抗议,亦是对上帝死亡安排的质问。

2.3 篇尾的双重叙事运动

小说篇尾的情节发展围绕格里高尔被家人厌弃直到死亡的不幸展开。我们发现,在叙述者与格里高尔的妹妹之间出现了叙事距离。叙述者讲述了格里高尔对妹妹的深情,但妹妹却对格里高尔日渐疏远。“妹妹现在再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让格里高尔吃上可口称心的饭食,她总是在早晨和中午去商店上班前急急忙忙用脚往格里高尔的房间里随便推进一点吃的,晚上根本不管这食物是否只是尝了几口,还是——大多数情况下——连碰也没碰一下,她便一挥扫帚将其扫了出去。”(卡夫卡,2012:72)妹妹对格里高尔的疏远被理解为她对格里高尔的厌弃。“她的扫帚是一种隐蔽的武器,取代了父亲具有明显攻击性的棍子。她的厌恶感觉是贱斥的迹象。”(Krause,2019:317)叙述者着重描述了妹妹对格里高尔由关心到厌恶的态度转变,透露出叙述者对妹妹自私和冷漠的反讽。在格里高尔其人的表意轨道上,有学者认为,妹妹的态度转变是导致格里高尔死亡的重要原因。她最后说服父母“设法摆脱它”的一番话被理解为对格里高尔的死刑判决(王晓林,2021:175)。在甲虫动物的表意轨道上,妹妹态度的转变象征着她从孩童向成年的转变,“设法摆脱它”的想法表明她愿意牺牲动物兄弟来“证明她对人类的忠诚”(Harel,2020:33)。在小说结尾,叙述者对家人的反讽语气更加明显。格里高尔的死亡并没有让家人悲痛,父亲说道“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卡夫卡,2012:82),他的死亡反而让他们如释重负并憧憬未来。

小说篇尾的隐性进程讲述的是格里高尔灵魂的“退场”及其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死亡从

抑郁到接受的态度转变。格里高尔的死亡在隐性进程中暗示着其灵魂的离开。格里高尔的灵魂离去时的平静表明,他已不再愧疚、担心和不舍,并已超脱了对在场的执念。此处,格里高尔的灵魂对妹妹的评价和叙述者的讲述之间出现了分歧。格里高尔的灵魂要求有“可口称心”(卡夫卡,2012:72)的饭食和整洁干净的房间,叙述者则认为“在这个操劳过度、疲倦不堪的家庭里,除了做些必不可少的事以外,谁还有时间去为格里高尔操更多的心呢?”(卡夫卡,2012:70)妹妹再也没有像以前一样精心地为甲虫-格里高尔准备饭食。在隐性进程里,妹妹的态度其实是其内心抑郁的表征。根据罗斯的观察,在丧亲的这一阶段,居丧者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漠不关心(Kübler-Ross,2005:30)。抑郁让妹妹变得冷漠,以至于没法对甲虫-格里高尔上心。后文中,妹妹“设法摆脱它”的这番话表达了她想要走出悲痛的愿望。在小说结尾,父亲“感谢上帝”的举动象征着父亲与冥冥之中的死亡安排达成了和解,最终接受了格里高尔已不在的事实。

读者往往容易忽视叙述者感知和立场下格里高尔家人的悲痛,没有发现贯穿首尾的死亡叙事,其原因大体有二。其一,受格里高尔视角的影响,读者的阐释大多局限在格里高尔的情感和视野里,往往只看到了格里高尔的不幸,认为其父亲则是无情和粗暴的惩罚者,俨然一副暴君的形象。其二,受到卡夫卡书信《致父亲》的影响,认为《变形记》涉及父子冲突以及父子间的相互怨恨。然而,事实是《致父亲》中也有父爱的描述。卡夫卡写道:“或者当母亲一次重病时你紧抓住书橱,全身在抽泣中发抖;或者当我最近那次得病时,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奥特拉的房间来看我,站在门槛上,只探进脖子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因怕打扰我而只用手势向我问候。在这种时刻,人们就会扑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而且现在写到这里也禁不住又哭了起来。”(卡夫卡,2015c:350)虽然卡夫卡抱怨父亲的暴力,但是他也承认这是父亲表达爱的方式。他曾对古斯塔夫·雅诺施(Gustav Janouch)谈及父爱,“他担心我。爱常带着暴力的面孔”(Janouch,2012:30)。可见,在卡夫卡看来,父亲的形象不是单一的。父亲既意味着上帝般的权威,也承担着守护家庭和关心家人的责任。当家庭面临苦难和变故的时候,不仅卡夫卡本人,而且家里的其他成员也一样要承受苦难。有学者就指出:“在这个伟大的童话中,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格里高尔所承受的苦难,而是他不经意间给他的父母和妹妹所带来的痛苦,其中映照出卡夫卡本人对家庭的感情。”(梅罗伍兹,2007:54)

3 存在性不安:两种死亡书写

在卡夫卡书信和日记里,“不安”是他用于内心剖白的高频词。例如,他曾写道:“别人的每一个看法、每一次偶然目光,都会把我内心搅得方寸大乱,哪怕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哪怕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都会叫我深深地不安。”(卡夫卡,2015b:223)从生存论心理学的

视角来看,卡夫卡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存在性不安。他的存在性不安主要由外界因素以及其内心的死亡恐惧造成(林和生,1997:42)。“今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在写作中把我的不安心绪完全地从我身上排除,正如它来自深处,我欲把它埋入稿纸的深处,或是用文字把它带入纸中,以至我能够完完全全地把写成的东西引入我身心中。”(卡夫卡,2015b:124)卡夫卡的存在性不安潜藏于其作品的深处,而作品中的死亡书写正是对这一存在论问题的重要回应。在《变形记》中,显性情节中的死亡书写出现在篇尾,聚焦于死亡的平静,回应了由外界造成的存在性不安;隐形进程中的死亡书写贯穿全文,展现了死亡的痛苦,影射出卡夫卡内心的死亡恐惧。

在显性情节中,格里高尔的死亡异常平静。平静死亡的背后是其象征的自由性、反抗性和献身性。首先,格里高尔平静的死亡表现了其死亡的主动性和自由性。虽然死亡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但也是生存弱者最后、最大的自由。格里高尔死亡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其反抗性。死亡宣告了格里高尔不再受役于外界的异化力量,他已从异化的身体和人情的冷漠中彻底解脱出来。最后,格里高尔的死亡还是一种献身性死亡。有学者指出,格里高尔的死亡对应了资本主义秩序中无产阶级的牺牲(赵山奎,2018:120)。卡夫卡称格里高尔的平静死亡为“满意的死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写的最佳的作品正是以这种能够心满意足地死去的能力为基础的。”(卡夫卡,2015b:290)满意的死亡不仅是卡夫卡的写作目标,更是他应对外界造成的存在性不安的有力武器。外界父亲的粗暴、母爱的缺席以及反犹社会情势等因素构成的存在性不安袭扰着卡夫卡(林和生,1997:40-41)。因此,他希望通过离群索居的死亡式写作来远离人群、与外界决裂,并通过虚构的满意死亡来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和抗争,从而消解其存在焦虑。

在隐性进程中,卡夫卡笔下的死亡则是存在痛苦的至深根源,具有被动性和剥夺性。开篇格里高尔的死亡突如其来,不是他自由主动的选择。格里高尔之死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剥夺性。死亡剥夺了格里高尔的生存权利,让他的灵魂经历有苦无处诉说,想要帮助家人却又无从帮助的痛苦。同时,死亡又威胁家人的生活信心,把他们拖入绝望、愤怒和抑郁这一系列的丧失之痛中。在隐性进程中,死亡痛苦的书写折射出卡夫卡心底的死亡恐惧。早在卡夫卡三五岁时,他的两个弟弟相继夭折,引起了卡夫卡最原初的死亡恐惧。卡夫卡童年时期的死亡恐惧成为了他内心最隐蔽、深刻的存在性不安。不同于情节发展中的象征性死亡书写,隐性进程中的死亡书写是在本体论上探索死亡,传达出卡夫卡对死亡以及走出死亡阴影的思考。个体有生有灭,死亡无法回避。人类要走出死亡的阴影和痛苦,就需要超脱对在场的执念,并接受死亡这一最本真的事实。卡夫卡的死亡哲学里,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生死相互因缘平衡。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影子。在卡夫卡与朋友的对话中,他坦言自己对庄子的死亡哲学非常着迷(卡夫卡,2015a:380)。

布朗肖指出,卡夫卡的死亡书写是他对死亡的实现和体验(布朗肖,2003:80)。《变形记》双重叙事进程中的死亡书写是卡夫卡以不同的方式实现死亡。情节发展是卡夫卡对走向死亡的实现,而隐性进程实现了卡夫卡走出死亡阴影的愿望。小说的双重叙事进程也让卡夫卡体验了不同的死亡。在情节发展中,卡夫卡体验了满意的死亡;而在隐性进程中,卡夫卡则体验了痛苦的死亡。需要指出的是,卡夫卡的两种死亡体验都是为了接近死亡,把握死亡,回应他的存在焦虑以及他对存在自由的探索与追问。简言之,卡夫卡的死亡书写是反向的存在言说,接近死亡的同时又远离死亡,完成了从“卡夫卡式死亡”到“卡夫卡式存在”的转变。“说到底卡夫卡的问题还是一个生存论的问题,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稍稍窥见卡夫卡的神秘意义的内核,并最大限度地接近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灵魂‘城堡’。”(曾艳兵,2024:51)

4 余论:双重叙事运动与折叠式故事形态

卡夫卡《变形记》的神秘荒诞常让读者感叹不已。卡夫卡研究专家索克尔曾表示,小说的多层次结构和深奥本质会挫败任何单一的阐释,层层包裹中的奥秘核心似乎永远无法企及(索克尔,1988:241)。事实上,想要索解《变形记》的奥秘,就不仅要认识小说“洋葱式”的故事结构,对其进行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解读,而且还需看到小说“折叠式”的故事形态,对其进行横向的双重叙事进程阐释。

小说故事的身体由于格里高尔的变形产生裂变,呈现出一种折叠式形态。将故事展开,读者可以看到,以变形为对折中线,不幸叙事和死亡叙事位居两边,形成一种对照关系。显性情节凸显人和动物的生存困境,隐性进程则强调死亡痛楚。情节发展对格里高尔的家人进行反讽,隐性进程则对亡魂格里高尔进行反讽。在情节发展中,死亡是存在的希望,而在隐性进程中,死亡威胁着存在。不幸叙事和死亡叙事形成强烈对比,任何偏向一边的阐释都是对小说对称性结构的忽视。

《变形记》的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并非完全对立、不可调和。将文本叠合,读者还可以发现二者的互补关系。在双重叙事运动中,两种截然相反的死亡书写的交叠揭示了卡夫卡对死亡既亲近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对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叠合透露出卡夫卡对家人爱怨交织的复杂情感;生存困境与死亡痛苦的融合将现代社会人存在的悲剧性暴露无遗。显性情节和隐性进程并列前行,既对照又互补,不仅丰富了故事的主题内涵,而且还赋予小说强大的叙事张力,从而增强了其作为经典的文学魅力。

参考文献:

Bruce, Iris. 1996. Elements of Jewish Folklore in Kafka's "Metamorphosis" [G] // S. Corngold. *The Metamorphosis: Translation,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1st ed.,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Inc.

- Harel, Naama. 2020. *Kafka's Zoopoetics: Beyond the Human-Animal Barrier*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Janouch, Gustav. 2012. *Conversations with Kafka: Notes and Reminiscences* [Z].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 Krause, Edith H. 2019. Aspects of Abjection in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J].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Theory* (4): 303-322.
- Kübler-Ross, Elizabeth. 2005. *On Grief and Grieving: Finding the Meaning of Grief Through the Five Stages of Loss*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Ltd.
- Ryan, Michael P. 1999. Samsa and Samsara: Suffering, Death, and Rebirth in "The Metamorphosis" [J]. *The German Quarterly* (2): 133-152.
- 大卫·赞恩·梅罗伍兹. 2007. 视读卡夫卡[M]. 孙文龙, 田德蓓,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 段德智. 2017. 死亡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胡志明. 2007. 卡夫卡现象学[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 江澜. 2020. 论作为文本叙述动力的疾病——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 47-58 + 157-158.
- 卡夫卡. 2012. 变形记: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M]. 张荣昌,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卡夫卡. 2015a. 卡夫卡全集: 第4卷[M]. 叶廷芳, 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卡夫卡. 2015b. 卡夫卡全集: 第5卷[M]. 叶廷芳, 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卡夫卡. 2015c. 卡夫卡全集: 第7卷[M]. 叶廷芳, 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林和生. 1997. "地狱"里的温柔: 卡夫卡[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莫里斯·布朗肖. 2003. 文学空间[M]. 顾嘉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申丹. 2020. "隐性进程"的独特性和其要求的叙事理论拓展[J]. 叙事研究(1): 49-64.
- 申丹. 2021. 双重叙事进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申富英. 2022. 论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概念建构、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价值[J]. 外国文学(1): 126-134.
- 申富英, 李英华. 2022. 幽灵批评的发展历程、主要观点与研究范畴[J]. 东岳论丛(3): 55-60.
- 瓦尔特·H. 索克尔. 1988. 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形记》[G] // 叶廷芳. 论卡夫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晓林. 2021. 判决、献身与反抗: 卡夫卡作品中的自杀书写[J]. 学习与探索(6): 174-180.
- 孝红波. 2018. 论卡夫卡《变形记》中的隐性叙事手法[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74-79.
- 谢利·卡根. 2016. 死亡哲学: 耶鲁大学第一公开课[M]. 贝小戎, 等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曾艳兵. 2024. 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专栏导言[J]. 外国语文(5): 51.
- 赵山奎. 2018. 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紫葳. 1980. 寓严肃于荒诞之中——读卡夫卡的《变形记》[J]. 外国文学研究(1): 101-104.

The Writing of Metamorphosis and Imagination of Death: An Analysis of the Dual Narrative Movement in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TANG Weisheng WANG Ling

Abstract: Until now, the academic comments on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have all been based on the explicit plot of Gregor's unfortunate existence after his transformation, without attention to the covert progression of death and the dual narrative movement. Analysing the writing of metamorphosis and dual narrative distances in the novel, readers can discover the implicit imagination of death embedded within it. In this covert narrative, Gregor's metamorphosis denotes his death. The narrative of death unfolds around two dimensions: the way Gregor's soul transcends his own death and the grief his family experience. The writing of death in the covert progression, reflecting Kafka's fear of death, is indeed Kafkaesque death experience and a discourse of existence. In "The Metamorphosis", the double narrative movements, contrasting and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convey rich thematic significance and show strong narrative tension. Thus, the literary charm of a classic novel is enhanced.

Key words: "The Metamorphosis"; imagination of death; dual narrative movement

责任编辑:冯革